



列寧 ЛЕНИН

金黃 則人 編譯
黃 金 則 人 編 譯

寧列 ЛЕНИН

譯編人則金
峯 黃

1938

序言

今日的中國，跟全世界一樣，還羈留在人類歷史的一個嚴重緊急的「轉變點」上面。

我們現在是已經實行着全民族的對日抗戰了。我們在這個轉變點上，不僅僅是鍛鍊着我們中國一國的運命，其實也正是鑄造着世界性的條件。許多人異口同聲地說：我們的抗戰，不是單純反抗日寇的問題，而是爭求世界和平的問題。這已經分明指出了這個轉變點確然是偉大的，是具有世界意義的。

列寧生前，就會經站在人類歷史的這個轉變點上展望過，努力推動過，給了世界人類以直接的影響。即以他對於亞洲和中國問題的一點來說，他就是第一個與以密切的注視甚至於重視的巨人。隨手舉個例子：他在大戰以前（一九一三年），曾寫

過一篇爛燦的文章，痛論『後退的歐羅巴和前進的亞細亞』（“Backward Europe and Progressive Asia”），指出了亞洲的鬥爭勢力的蓬勃。他又在別一篇論文里，說：我們中國的人民是『真正偉大的人民，中國人民不只會痛憤自己的處於長期奴隸的地位，不只會幻想自由和平等，而且能夠進行鬥爭，去反對千百年來的壓迫者。』倘在現在讀到這樣感奮的語句，我們也會深切地覺得他所說的「能夠進行鬥爭」，簡直彷彿就是說「能夠進行抗戰」；所說的「反對千百年來的壓迫者」更好像是指着今日的日帝國主義一樣。

列寧不只是某一個階級的導師，不只是某一個民族的領袖，而且是在人類歷史的一個嚴重緊急的轉變點上具有世界意義同時也留下了世界影響的一個巨人。他的畢生的活動——偉大的生活，事業和遺教——可以充分地表現着他確然是這樣一個

認為他安然逝世了的時候，却也聯合起來，對他大唱其讚美歌。關於這種把死了的革命家『聖徒化』的情形，列寧生前曾用過燃燒着的貶詞寫着：

「當偉大的革命家們活着的時候，壓迫者階級曾招待他們以殘酷的迫害，並且用了謠言和污蔑混成的最野蠻的敵意、猛烈的恨惡和最暴戾的進攻，來接受他們的遺教。等到他們一旦死去，就來了各種的企圖，使他們（革命家們）一變而為無傷害的聖像，使他們一變而為聖徒，並且用了某種的光輪，圍繞着他們的姓名，以『安慰』被壓迫階級，而實際目的却是欺騙他們，同時更閹割了、俗化了他們的革命理論的實質，磨鈍了他們的革命的尖端。」

——參見英譯本列寧著「國家與革命」第七面。

這種「聖徒化」(canonizing)的現象，是已經被追封到列寧身上了。「革命」

的敵人們，改良主義和投降派的辯護士們，甚至頑固派的首領們，都一齊竭力稱讚列寧的那種「現實主義」的和「政治家式」的特質，企圖把列寧的革命聲望的光輪投到反動政策那方面去，使高漲着的革命發展弱化起來。

凡是不能把對於列寧的任何研究，竭力不使列寧的生活、事業和遺教方面的一「革命尖端」磨鈍的話，那麼，什麼都夠不上稱為正義的；而尤其重要的，是還要保持列寧觀點的本質——理論和實踐的統一。研究列寧的生活，其價值決不在於學院式的歷史或主觀的批評，決不在於當作崇拜他或詆毀他的 一種無聊的練習；而是在於當作客觀的歷史運動的理解方面和今日環繞在我們周圍的緊急的世界問題方面的一種直接的助力。」

英國的政論家 R. P. 杜德 (R. Palme Dutt) 是用了上述的這種「列寧觀點」，才寫成他的關於列寧生活的一部著作；現在我們在這里寫列寧傳記的精神態度，也不敢有所乖違；雖說我們自己對於列寧的研究也淺陋得可以，但在基本上，

至少可以說，對於這個目標是相當地接近的。

我們編譯這部傳記，雖然是並不會經過彼此的商榷而「合作」出來的，但是因為觀點上的比較統一，還可以自信沒有什麼被磨鈍的「革命尖端」的存在，更沒有「學院式的歷史或主觀的批評」的混跡。所有的內容，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客觀的歷史運動」和「今日環繞在我們周圍的緊急的世界問題」。

當初，則人兄決意寫這部傳記，是在一九三三年。那時，出版界感着無書可出的苦痛，從印刷機上轉動出來的是一大批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流的「英雄」傳記，而列寧竟無人垂青。則人兄偏偏不甘寂寞，便開始默默地埋頭於這部「列寧」的編譯工作。本來他是很快地可以帶着這部重要的出世作「列寧」而踏進文化界去的，因為當時他對於這項編譯工作進行得很順利，而且出版條件也已經接洽妥當。可是當他從第一章寫到第五章的時候，出版環境却一天惡化一天，終於不得不使他從事於別的事情，而把這部「列寧」暫時擱筆。

一擱就擱了四五年之久。現在已經是淞滬抗戰後三個多月了。自我軍退出淞滬以來，出版界又痛感到無書可出的苦痛了。印刷工廠逐漸陷入了停業的狀態，排印工友無處立足，便只得紛紛回到老家去；同時，一部分無家可歸的工友們，饑寒交迫，只得乞援於廠方和書店，給他們以一些排印工作，維持暫時的生計。在這個危急情勢中，書店主人才想到了這部在舊書箱底里深睡了好多年的「列寧」，經過檢點原稿後，便交給這些工友們去付印。至於原稿未完成的部分，他本已決定請原手續完它，而那時因則人兄已經離滬多時，「遠水救不得近火」，於是乎就約我「弄弄好」。因此，在這部書中，從第一章到第五章，出於則人兄之手；從第六章到最末一章，以及作為本書「發端」的「列寧的時代」那一章，便是我所執筆的。我不知道現在的這個「狐尾」，也可以「續貂」一下否？

寫到這里，使我孟憶起列寧的前輩馬恩兩老合作「神聖家庭」的盛事，禁不得出了一身大汗！

黃 峯

記於日寇包圍和封鎖中的上海。

發端 列寧的時代

生於一八七〇年而死於一九二四年的列寧，橫亘着十九世紀最後的廿五年和二十世紀最初的廿五年。他的積極的生活，橫亘着十九世紀最後的十年和二十世紀最初的廿五年。

這一時代，是發生着決定的變化的時代，也是人類歷史上的轉換點。一九一四年的大戰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就是這一轉換點的顯著的標誌，它的全部意義，還剛正在被開始理解着。而列寧的生活行動，正屹立在這個「變形」(transformation)的最中心。

列寧的精力，全然不同於同時代的一切其他的政治思想家和領導者，他自從很年青的時期起，就獨自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強固的基礎上；而且從十九世紀告終以

前，憑着他的明澈的眼睛，他已經透視到未來時代的全部性質，已經在爲着這個未來而準備，已經抽引出實際而且具體的結論，只要那個時代一到，他更會獨自地適應於歷史的要求。

列寧的這種無比的精力，把歷史的運動瞭望得這樣明澈，這樣正確，這樣遼遠，究竟是怎樣造成的呢？他的這種精力，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面吸收過來的，他又把新的生命賦與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把那已經落在腐儒、俗物以及凡庸的政客手里的馬克思主義救拔了出來。

爲要明瞭列寧的工作，我們就有理解他所承襲的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之必要，就有理解他從事活動着的時代之性質。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特質，就是對於自然、人生和行動全體的一個單純的、科學的世界觀之特質。

馬克思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第二個廿五年之間。當時，「既存社會」的基本矛盾

盾，已經堅強地凸顯到浮面來了。

這一時代以前，一系列的長時期的中產階級的革命，已經在世界主要各國，尤其在英、法、美諸國，建立了資本主義的政權。資本主義的各關係，統治了全世界。機械工業表現了它的巨大的擴展。「自由資本主義」(liberal capitalism)的概念——這是從『人權』(Rights of Man)和「自由、平等、博愛」(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的口號上面接受了理想的、反抗性的表現，後來又在民族國家、立憲政府和國際貿易的骨架之中凝固起來的概念——便被視為人類發展上的高峯，出現於新的統治者布爾喬亞犯的面前。

可是資本主義統治的消極面，也已經同時出現了。「自由、平等、博愛」這個口號，對於勞働人民大眾，只是一種空洞的飾詞，遮蓋着這一階級被別一階級統治的事實吧了；而大眾則依然地流落在難堪的苦辛、貧困和奴役的境遇里面。生產和消費的無政府狀態；循環不息的危機；財富和窮困之間的無邊的兩極和越隔越闊的

深淵；商業主義與營利生涯在全世界上的野心的搶奪；一切都呈現着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

正在掀起的未來的新社會勢力——勞働階級，以他們的勞働力來造成資本主義財富的勞働階級——如今是成爲了一種積極的、獨立的因素，積聚起羣衆性的反抗，而開始在社會的、政治的舞台上，最初還是模糊的，然而已經表現着正在激增的政治目的和政治意識，特別顯著地表現在英國的革命的「工會主義」(trade unionism)和「改進主義」(Chartism)上面。到了這個時候，布爾喬亞就一反從前革命的工作，越弄越明顯地轉變到反革命的工作去，成爲反對新興勢力的既存制度的保衛者了。

緊隨着勞働階級反抗的開始，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也就出現了。一派是轉向於中世紀的懷戀(例如英國的加拉伊爾(artyle)或朦朧的人道主義的衷腸(例如西斯蒙田(Simonidi))。另一派却是努力地憧憬着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發展到「烏托邦社會

主義」(Utopian Socialism)的初期理論(指聖西門St. Simon、傅里葉Fourier、奧溫Owen)。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批判了資本主義的罪惡，擁護了一個合作形式的社會制度，然而他們並沒有關於社會發展方面任何樣的明確的概念，主要地却委身於對他們全無用處的統治者布爾喬亞，而偏偏對於獨自地足以實現他們的目的之階級鬥爭表示悲感。

同時，思想和哲學的發展，指出了向新階段前進的形勢是已經成熟了。布爾喬亞的思想，正碰到了思想發展的限度，開始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布爾喬亞的古典哲學的最高峯，是黑格爾在十九世紀第一個廿五年間就達到的。黑格爾完成了一種深刻的革命工作，破壞了先哲的主觀的唯心論的獨斷的預測，和經驗論的懷疑主義，首先建立了對於宇宙、人生和社會的一種批判性的客觀的理解，把這些理解為一種有系統的、有交互關係的發展過程，辯證地通過着矛盾和衝突，才前進到新形式，他又認為我們對於它的進行法則，是可以理解而且駕御的。但是他仍然讓

這一過程中的主要因素安置在神祕的唯心論的圈內；正如他把「國家」神祕地安置在「市民社會」以外和以上一樣，其實呢，國家只是「市民社會」的產物和反映。因此，他的哲學，依然爲唯心論所牽累，還不是完全地批判的、科學的，而其結果，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神祕主義和反動，成爲普魯士帝國的撐腰者。雖然如此，他的哲學仍不失爲布爾喬亞派最後而且是最偉大的哲學體系；黑格爾之後，布爾喬亞哲學（撇開「左翼黑格爾派 Left Hegelian、費爾巴哈 Feuerbach、唯物論者而說」）就流於無理性的主觀主義，經驗論，七拼八湊的斷片，以及一堆一堆的騙話。

同樣地，布爾喬亞派的古典的經濟學派的最高峯，是李嘉圖 (Richardo) 在十九世紀第一個廿五年間就達到的。古典的經濟學家都曾經竭力地作出過一個關於新社會經濟基礎的科學分析。然而他們終究爲他們對於布爾喬亞制度的無意識的預測所束縛，從而認爲布爾喬亞制度就是一個自然的和永久的制度，因此，其結果當然被糾纏得沒法可想，無從發見出關於賦稅、利潤和利息方面的一種科學的解說。從

此以後，布爾喬亞經濟學，便放棄了使它成爲一種科學的企圖，只局限於經驗論的市場算盤的水平，因而完全沒有力量去理解或預知較龐大的經濟諸過程，這在今日是已經引爲一種笑話的資料了。

只有自然科學——這是對於資本主義在技術上有用處的——總算還能夠通過十九世紀而繼續地發展，甚至只有在這裡，還對於反動的統治勢力發生着經常的衝突。不過，自然科學是只在若干人們個別的工作領域中進行的，並沒有被一般人較普遍地理解；這樣說來，一旦前進的勢力打破了臨時的陣營，強迫着人們需要更基本的理解時，那就無可幸免地陷入相繼而來的科學的難關和危機。

在對於人類的生活和歷史，社會的和政治的制度的總關係（不是孤立的），企圖作一種科學理解的人們之中，馬克思就是第一個，在他以前，人們差不多連這個概念都是不曾想過的。

因此，馬克思以前，人間是盲目地發展過來的，是通過了「敵對勢力」的盲目

的交互作用而發展過來的，可駭的結果雖往往發生，而集團理解的企圖，却總是沒有的。

這種盲目的發展，只要是舊勢力統治一天（前次的世界大戰和目前的世界經濟危機），總是繼續一天的；但是集團的科學的理解和行動（馬克思主義或「國際共產主義」，由國際勞動階級所代表的）的新的組織力量，能夠勝任各階段的增強的任務，並且到了最後，它一定會駕御這個過程。

就在十九世紀這個嚴重的階段，就在新的勢力、問題和衝突在各方面叢叢生長的當兒，也就在當時佔着統治地位的布爾喬亞思想對於問題的解決上正在弱化和枯竭的當兒，馬克思就憑着他對於一切從前的思想和知識的深刻研究，對於當前的世界現實的深刻研究，他已經能夠識破一切的障礙物，指出前面的道路，於是，他就以現代世界的創立者和建設者的態度，挺身而出現於十九世紀了。

馬克思首先構成了一種完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就是「辯證法唯物論」

的視野。

馬克思承襲着黑格爾辯證法的衣鉢，然而脫出了它的武斷的唯心主義的成分。跟費爾巴哈——他是唯物物的、黑格爾信徒——一樣，他看出了「觀念世界」並不是從「虛無」之中產生的神祕的創造，而是「物質世界」的反映。但是他跟費爾巴哈的消極的唯物論不同，也跟法國和英國的唯物論者的機械的唯物論不同，就在於他是仕奉着思想過程和人類活動的實際任務的，不僅把它們作為物質世界的消極反映，而且把它們反過來作用於物質世界，而使其變形。因此，辯證法唯物論的顯著特質，就在於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哲學家只是用各種方法說明這個世界；他的任務是要變更這個世界。」（見馬克思著「費爾巴哈論綱」Theses on Feuerbach）。這一個概念，在馬克思和列寧兩人的生活中，更臻於充分的實現。

就在這個視野的基礎上面，馬克思已經能夠把人類歷史的發展實行分析了，不再把它看做「偶發事實」的不合理的混合了，也不再把它看做武斷的觀念和見解的